

文學中的“終極關懷”

——中國比較文學協會第十三屆年會“比較文學
與宗教研究”圓桌論壇綜述

Ultimate Concern in Literature: A Review of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Studies”
Roundtable of the XIII Triennial Congress of CCLA

崔子鵬

CUI Zipeng

作者簡介

崔子鵬，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博士候選人。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CUI Zipeng, Ph.D. candidat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kinz@ruc.edu.cn

Abstract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Studies” Roundtable of the 13th Trienni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CCLA) was held at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China, from July 24-26 2021, under the theme “Ultimate Concern in Literature.” 22 scholars from various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in China, the UK and the US were invited to present papers. During the three-day meeting, a range of issues were discussed by participants, from the significance and extension of the Ultimate to how literature expresses “Ultimate Concern”; “Ultimate Concern” in classical civilization; the modernity and “Ultimate Concern”, and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of “Ultimate Concern”. This review outlines the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Roundtable and their major findings.

Keywords: Ultimate Concern, Literature, Religious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導言

由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專業與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承辦的第十三屆中國比較文學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之“比較文學與宗教研究”圓桌論壇於2021年7月24—26日成功舉辦。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山東師範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復旦大學、廣西民族大學、雲南大學、北京語言大學、中央民族大學、黑龍江大學、閩江學院、濟南大學、河南大學、格拉斯哥大學、耶魯大學、澳門聖若瑟大學、美國賈德森大學的22位與會專家就“文學中的‘終極關懷’”這一議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討。

在神學家保羅·蒂利希看來，“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並不負責處理或解決“終極”的問題，而是對冠以“信仰”之名的意向性行動的進一步闡釋。如字面意義所示，它的一端是絕對的“終極”所在，另一端則是源自有限個體的“關懷”。人們對“終極”的體認近似於一種存在主義式思維，以自身之“有限”遭遇世界之“無限”，“無限”便成其“神聖”與“終極”。“關懷”則是某種“行動”的“發生”之“生”，因為投注“關懷”，作為主體的人和作為客體的世界才產生了進一步具體連接的動力。“終極關懷”代表着有限的個體在近乎無限的距離下對遠方“終極存在”的遙望與沉思。推而言之，於更廣闊的人文學科語境中，對“終極關懷”的體認和思索更可以被轉化為站在人類有限性一端遙望存在之“無限”意蘊的體驗，它從人類文明誕生的那天起就作為一種基本的問題意識存在，進而演化出哲學、宗教與文學等多種“關懷”的具體形式。“終極”之問無關某個明確的命題，也從來沒有唯一的回答，面向“終極”的“關懷”也就代表了在所謂“答案”之前永遠保持敞開的無盡可能。

七場圓桌討論歷時三天，與會專家學者圍繞以下主題展開了精

彩的論述：“終極”問題的意義及其延展；文學何以表達“終極關懷”；“終極關懷”在哲學史視域中如何呈現；古典文明中的“終極關懷”；串聯神學、哲學與神學重要問題的“終極關懷”；從文學的角度看自我與終極者的相遇；宗教領域的跨文化對話；“終極關懷”與“神聖”之間的張力等等。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楊慧林、曾艷兵，北京語言大學張華、山東師範大學于冬雲、中央民族大學宋旭紅、澳門聖若瑟大學麥侍文（Stephen Morgen）、美國賈德森學院（Judson College）金容希（Sharon Kim）等發言人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一、文學與“終極”的延展

中國人民大學楊慧林通過論文《從〈李爾王〉解讀終極關懷》闡述了本次圓桌論壇的主題，並以莎士比亞名作《李爾王》和英國王朝歷史為例說明西方文化中的“終極”問題。《李爾王》改寫了“老王復位”的民間故事，不斷質疑任何一種“被作孽多過自作孽”的“脫罪”之說。莎士比亞筆下的李爾王在告訴世人，世間的悲劇總是無可挽回、也無從避免；早有鑒戒、卻循環往復；傷天害理、又不知何為天理；罪孽深重、卻無人敢稱自己是純然無辜的受害者。在楊慧林看來，莎士比亞讓“自作孽”與“被作孽”相互消解，又通過理性、歷史甚至神明的內在悖謬，最終使“終極”的問題在“終極”的意義上重新提出；這亦如弗萊通過“次級關懷”揭示自我神聖化和自我合法化的虛妄，進而重構“終極”的問題。因此，勘破一切可能的“偽終極”應該是“終極關懷”的基本前提；“何為終極”（what is the Ultimate）的追問注定是沒有結果的，注定會轉向“何以思考終極”（how to think ultimately）的邏輯。

賈德森大學金容希（Sharon Kim）的論文《赫爾曼·梅爾維爾〈白鯨〉中的懺悔與終極性》通過另外一部名著來討論文學中的“終極關懷”。她認為，《白鯨》中的“懺悔”乃是回應“終極性”的一

種模式。懺悔是有限的人類與無限的神聖之間的中介，起到了整合而非分裂的作用。在人類與神聖的互動過程中，懺悔令人類經歷了生存轉變，讓人得以適應神聖，減弱因接觸全然他者而招致的毀滅性元素，使二者之間的相遇轉移了直接的創傷，並防止後續創傷的重演，同時，懺悔為人類接近神聖打開了一處通道，允許神聖的終極性通過人類語言而為人所知，從而彰顯出只能以懺悔的方式才可以揭示的神聖層面。耶魯大學司馬懿（Chloe Starr）教授對這篇論文做出了回應，認為在《聖經》文本和虛構文本之外，“懺悔”的時間特質往往被人忽視。懺悔產生於人與上帝的相遇，如“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伯42：5-6）亞哈船長與約伯同樣面對“終極”，亞哈船長何時懺悔，又為何而懺悔也能成為從文本論及“終極關懷”問題的入口。

黑龍江大學田剛健的論文《對極性——巴別爾小說主題悖反中的終極關懷》討論了對極性與“終極關懷”之間的互相闡釋。“對極性”是一種貫通歷史與當下、現實與傳統之間隔的對立統一狀態，藉由此概念，田剛健切入了巴別爾小說中的“終極關懷”。中西方對“終極關懷”的理解或有不同的側重，但同樣都是未來對當下的召喚和塑形。文學作為一種個人化的情感經驗，在對終極關懷的關照中方成就其公共性和永恆。俄羅斯文學中濃郁的極端化色彩充滿了對極性的向度，這和東正教中的密切關懷維度相關。巴別爾作為蘇聯革命文學話語中的另類，其特徵是暴力與夢幻混雜的異類風格，對極性與悖論性可以說是他的創作核心。通過分析小說主題的對極性特徵，文本中有限與無限、神聖與日常中的意義和魅力才能在不确定性中真正成為一種“關懷”。

中國人民大學曾艷兵在卡夫卡研究中進一步延展了“終極關懷”的文學意義。《卡夫卡作品中的終極關懷》討論的重要問題緣自米勒《共同體的焚毀》和南希《無用的共同體》中不約而同提到的“共同體的崩解”。卡夫卡的小說描繪了共同體的焚毀，預示了我們當下所

處的時代。卡夫卡一生似乎缺乏統一的堅定的宗教信仰，但他始終不缺乏對個人乃至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這種關懷就是深藏於內心的“不可摧毀之物”。在卡夫卡那裏，希望是有的，但似乎不在這個地球上。逃出地球，流浪地球，或者就是人類最後的希望。卡夫卡最終拋棄了一切，他選擇了創作，因而擁有了最後的希望。卡夫卡的作品總是糾纏在死亡與自殺這些致命的問題上，正如卡夫卡也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深陷其中一樣。在卡夫卡看來，那些最有意義的書就是一些類似自殺的書，“一本書必須是一把能劈開我們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

雲南大學黃增喜試圖立足於黑塞與伊利亞德在思想傾向、文化立場等方面的相似性，以伊利亞德的宗教觀念為參照，分析黑塞的鄉愁主題，並由此間接觀察“終極”問題。在論文《永恆、自我與自然：以伊利亞德宗教觀念解析〈東方之旅〉的鄉愁主題》中，黃增喜指出，在伊利亞德看來，宗教傳達着人類對於完美的神話樂園之鄉愁；雖然傳統宗教在現代世界走向了衰落，但“樂園的鄉愁”卻在現代文化與文學藝術中得到大量的遺存。結合黑塞其他代表性作品來看，《東方之旅》中的鄉愁包含“永恆”“自我”“自然”三個維度，與伊利亞德所言“樂園的鄉愁”形成了諸多層面的呼應。具體而言：東方之旅既是人類克服時間性存在、尋歸永恆家園的精神之旅，也是個體克服對極性存在、追尋整全自我的象徵之旅，還是人類克服其與自然的對抗、恢復原初和諧的烏托邦之旅。雖然黑塞主要將克服現代精神危機的希望寄於藝術，但其對危機根源及克服危機之途的思考均帶有濃鬱的宗教底色，始終在藝術與宗教之間游移。就此而言，在《東方之旅》和黑塞此前作品之間並不存在截然的斷裂，而是表現出明顯的延續性。在伊利亞德宗教理論視閥中考量《東方之旅》，不僅有助於澄明作品中的諸多隱晦細節，也有可能為黑塞其他作品的研究提供一個整體性的參照。

二、古典文明中的“終極關懷”

早期古典文明的“終極”體驗往往與死亡密切相關。中國人民大學趙偉的論文《〈吉爾伽美什〉史詩中的“幽深”》簡述了史詩《吉爾伽美什》的發掘背景與情節，並着重討論文本中與“死亡”相關的意象。吉爾伽美什對死亡的認識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起初他並不在意死亡，但他在經歷了摯友恩啟都的死亡之後，踏上了尋求永生的道路。死亡之“幽深”在史詩中表現為不可相像與不可預測：“頃刻間，一切都會化為烏有成子虛。”論文最後還對比了史詩中“壽滿天年”之人“自己的命數之死”（mūt ilišu）與里爾克《貧窮與死亡之書》中“自己的死”（der eigene Tod），指出“終極關懷”下死亡的意義所在。

中國人民大學張靖的論文《失與得：聖經比喻中的終極關懷》所討論的“失與得”問題乃是弗萊“次級關懷”的進一步思考，因為勘破“次級關懷”虛妄的行為意味着既有所失，又有所得。張靖提出，應考慮《新約聖經》中耶穌比喻（Parable）這種特殊文體的功能性，耶穌使用這種文體是為了解構和顛覆當時人們習以為常的意義和價值。論文以《路加福音》15章的“失羊比喻”“失錢比喻”和“失子比喻”為例，重新解釋“失”與“得”的內容以及文本中隱含的詮釋張力，進而提出，耶穌的三個比喻指向的天國有着與這個世界不一樣的“得失”觀和倫理觀，世人在“失”後會“得”，但“所得”並不是我們預先期待的東西，而是與這個世界不一樣的倫理和秩序。終極問題只能通過有限的感知來啟發我們，因此耶穌通過比喻這樣的故事打破我們所認可的世界的深層結構，讓我們反思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中隱而未現的方面。這些故事拆除了我們的防禦，讓我們真正與“終極”的問題相遇，由此生發“終極關懷”。

中國人民大學李丙權挖掘了古希臘哲學中的“終極關懷”思考。

他在《靈魂不朽和蘇格拉底的拯救》中提出，“蘇格拉底事件”“基督事件”都是歷史人物的死亡，不僅僅關乎兩個肉體的死亡，引發了深遠的影響。蘇格拉底事件在《申辯》《克里同》《斐多》等古典文本中呈現出不同的側面，並影響了隨後的哲學傳統與神秘主義傳統。蘇格拉底與終極關懷的連接集中在兩個面向：情感上的“關懷”與關懷之物確然能夠被稱之為“終極”。哲學中的“終極”與宗教中的“終極”類似，在哲學中同樣表現為不可實體化、不可理論化的形式概念。蘇格拉底以“靈魂不朽”論證“終極關懷”，以《理想國》中“靈魂三分”的行動原則反觀自我與人格的構建，思考個體與整體的關係。通過對終極世界的靈魂的觀望以及對人間正義與至善的追求，對“終極”的思考同樣也成為了蘇格拉底哲學中對“何為好的生活”之反思。

三、“終極關懷”與現代性

中國人民大學汪海試圖說明主體的“見證”行為乃“終極關懷”得以成為問題的重要前提之一。《歷史之外的證言：利科、德里達論文學的見證》此篇論文梳理了奧斯維辛之後，現代西方人文學界關於“見證”之困境的諸多討論。論文通過整合利科、德里達等思想家的相關論述，從跨文學、哲學與宗教的角度考察文學與見證的關係。二人都高度重視文學在見證中的獨特作用，雖思想進路不同，但他們對見證的重新解釋卻有許多共鳴之處。其中利科的見證始終處於包含見證者、證言和聽眾在內的盟約與行動，並帶有了神學的意味。德里達的見證則偏向構建行動與語言的創造性關係，將見證訴諸審判，從而賦予了文學在歷史之外的末世論意義。

中央民族大學宋旭紅從我們所身處的虛擬時代出發，思考“終極關懷”將何去何從的問題。她的論文《虛擬時代的詩意真實與終極關懷》從海德格爾和余秀華“農婦的世界”說起，海德格爾藉藝術作品

中“農婦的世界”之敞開論證藝術的本質即“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設置入作品中”。當代詩人余秀華以自身經驗構建“農婦的世界”，其詩歌蘊含了獨特的梅洛—龐蒂式知覺主體的視角。身體—知覺世界與詩性/藝術世界之間的對比就涉及了當代世界的人們對“終極”的感知變化，身體在這個過程中必須要考慮，甚至是它的前提和基礎，因為它是後者“有限/無限”場域中的有限性維度。而在虛擬技術飛速發展，“去身體化”日漸成為風潮的今日，“終極關懷”還是否能作為一個具體的問題，所謂“詩意的真實”又將去向何處？宋旭紅教授認為，目前還沒人能給出答案，在“去身體化”的邏輯裏面，“農婦的世界”正在變成被圍觀的“景觀”，而圍觀尚且不具有探知存在深度和構建世界的力量。

北京外國語大學黃強聚焦著名詩人艾略特，以《沉沉死氣荒原漫，終極關懷何處尋？》為題，探索艾略特對“終極”問題的思考。黃強認為，無論批評界採取何種方式解讀《荒原》，都繞不開《荒原》所引出的“終極關懷”議題。《荒原》詩中引用了大量的比喻和典故，同時也能讓讀者在閱讀時代入到當下的情境與危機之中，以弗萊所言之“超越性”介入到“終極關懷”的問題之中。《荒原》的六節詩章可以被解讀為人類文明與精神發展的歷程，論文詳細介紹了每節詩章與文學史乃至文明史的關聯，及詩歌如何從西方古典文明、現代世界和東方印度教思想進入“終極關懷”的問題領域。艾略特的《荒原》展示了一個即將崩潰的世界，亦通過文學的路徑重新思考“終極關懷”的多種可能。

南京師範大學許詩焱則介紹了荒誕派戲劇中的“終極關懷”，她以《從文學經典看終極關懷——荒誕派戲劇》為題，聚焦尤奈斯庫的《禿頭歌女》，指出，“荒誕”實質上是人在喪失了對未來世界的希望之後與生活之間的分離，其哲學基礎與存在主義類似，卻更多地跳脫了理性的藩籬。論文指出，荒誕派戲劇的形式與文本在研究的過程中同樣重要，其表演形式有時能引起觀眾更多的反思，“開始”與

“結束”在表演中以“死亡”與“新生”的倒轉形式與“終極關懷”相契合。

四、“終極關懷”的宗教維度

聖若瑟大學麥侍文 (Stephen Morgan) 的論文《實現有形與無形之事：若望·亨利·紐曼著作中宗教相像力的作用》以十九世紀英語界最多產兼極具影響力的基督宗教作家亨利·紐曼為主要研究對象，從紐曼對相像力作用的理解出發考察“終極”與信仰，“終極”與相像的關聯。紐曼的作品結合了基督教的情感與理性，用個體的相像力連接了宗教的客觀教義與個人理解。他認為宗教的真理更多的時候在用一種相像的方式進行表達，因此宗教文學在某種意義上也更加接近宗教的“真理”。“相像”在紐曼的宗教文學中並非與“真實”對立，而是一種獨特的認知能力。具體來說，紐曼的“相像力”是心智的能力，它通過在個體的心中構建圖像，成為一種利用“心靈的眼睛”領悟啟示的過程，即所謂的“相信如看見”。通過相像力的喚起能力，主體才能在心智中充分理解宗教理念本身所具備的超越性。格拉斯哥大學的大衛·賈斯柏 (David Jasper) 教授在回應論文時補充說明了紐曼研究的其他重要問題，如紐曼的“相像力”遠離柯勒律治“相像力”論說的原因，相像力是否與聖事相關聯，理性與相像力的關係，相像力何以超越自然宗教與啟示宗教的對立，以及在紐曼的論證中，相像力如何使“觀念”更加真實。隨後，麥侍文教授從紐曼本人的創作經歷出發，指出“相像力”在紐曼的思想中怎樣通過“類比”和“意義”的橋樑呼應“現實”。

北京語言大學張華從生態神學的角度思考“終極關懷”，其論文《生態神學是甚麼？》介紹了生態神學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思。論文從批評基督徒神學的必要性切入，在傳統基督教神學中，“神人之約”不僅確立了上帝的絕對神聖地位，也賦予了人管理萬物的職能，

此種認知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人類在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時狂妄自大的態度。莫爾特曼認為，所謂神對人的授權，以及人對自然無限的征服實質上是對上帝誡命的誤讀，以及一種試圖成為上帝的“僭越”。張華認為，人類文明目前遭遇的生態危機是否能夠完全歸結到基督教思想的影響上仍值得探討，但生態神學確實為人類中心主義提供了反思的進路。最後，論文回到文學和生態反思的結合，在今日的語境下，只有通過文學和批評的聯合才能充分表達和表現“終極關懷”之要義。

濟南大學文學院劉麗霞的論文《清末民初天主教白話聖經譯寫及其滯後原因》轉向了與“終極”問題密切相關的中文聖經翻譯。她指出，清末白話文運動同樣影響到了天主教的《聖經》統一譯文問題，並由此產生了一些見諸筆端的論辯，折射出天主教內部對白話文運動的多面心態。天主教本身較為保守的理念和側重底層的傳教策略也導致教士們對社會變革缺乏適應能力，經文的翻譯工作也極為繁重和艱巨。此外，教理書籍的興起也在一定程度上轉移了教眾閱讀經文的注意力，各種因素混雜在一起，天主教的白話聖經譯本工作因此而拖延。對比新教《官話和合本聖經》的翻譯及傳播，天主教傳教士於清末民初的傳教策略局限性則更為明顯。

本次圓桌論壇匯集國內外相關領域的諸多優秀學者，對“終極關懷”相關的各種議題都進行了深入的討論與交流。“終極關懷”之問題在當今已經變得無比重要卻也極易被人忽略，從古典文明、哲學、文學、宗教等角度對“終極關懷”的多元化思考恰呼應了人文學者最重要的批判與反思精神。無論“何為終極”還是“何以終極”，作為個體的“終極之思”本身就閃爍着從“有限”飛越“無限”的智慧之光。